

旧时邦夏人 一天只吃两顿饭

这不是讲遇天灾人祸的故事，而是讲半个多世纪前生长地——邦夏的生活习俗的故事。

邦夏人一天只吃两顿饭？

我辈邦夏乡亲不妨仔细回忆一下，我们家里是不是早晚只煮两顿饭？中午那顿饭有煮吗？

我们当小学生时早晨有吃米饭上学的吗？我敢断言，多是家里买了多种粿，各自选吃了就上学去。另一种选择是炒一包粿条(这里叫河粉，当年只要半盾就可炒一包。)吃了上学去。中午放学可以不回家吃午饭，早晨向母亲先讨了五十仙或一盾，就可以买粿吃，当一顿午餐。

父兄辈也是一早就坐咖啡店歇咖啡，桌面有香蕉叶包裹蒸的香蕉粿、煎炸的Pisang-goreng(炸香蕉)、喜醇粿、红印粿、层高粿等供选食用，早餐还有肚子装吗？一般家庭早餐煮饭主要是家庭主妇和还小的孩子吃。

晚餐一般是4桌半至5点之间，吃完饭就收拾好，大多数人赶赴看首场电影，甚至到行程约一小时的石咀看日落。回想起来真是惬意。

潮州人、福建

人习惯早晨喝稀饭(粥)，他们极喜欢唐山来的菜脯、咸菜，还有榄角(柑榄之一种)；当老板也不改生活俭朴的美德。长达40的“官司”不攻自破1960年邦夏灾侨第一批安置到离龙海县约20公里的双弟华侨农场是1956年印尼巨港龙海老乡集资开办的农场，安置回来读不了书，回到原籍又无法安置的几十个青年。

农场四周是山，进农场的车路是附近农民用三个月，日夜赶工将各村道路联通、加扩，才使接侨车开到农场。

当时市县委统战部、侨委(后来的侨办)、侨联大力宣传，印尼反华排华，安置到双弟农场是家被大火烧掉的灾民，正处于流离失所、在垃圾堆捡东西吃，让我国派船接回来。这一说法深深打动人们的同情心，化作加紧工作，和作出相应的支持。

5-19，得悉父亲到县医院看病，我向学校请假到双弟探望。大概八点多，我们跟着回农场的医生：中午在修水库的工地搭伙吃一顿饭后，即沿山路走到下午三点多到洲仔村，再由乡亲用脚车载到寨仔村，见到父母弟妹。一下子邦夏乡来都围

拢到我家来，哭哭啼啼，说我骗了他们，回到大山里。

诉说农场干部批评归侨，回到祖国，有工作、有饭吃，还嫌不好。眼前所见，与回国前的理想简直是两回事！

第二天，我带了相册到耕作区，见到耕作区主任及姓陈的场长，与他们评理：邦夏灾侨绝对没有到垃圾堆找东西吃。

围观的归侨他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中华公会的救济。更说到双弟连房子还没做好，根本无条件接侨！

其中讲到邦夏人习惯一天只吃二顿饭。讲到这，本地人怎么也不相信。姓甘的书记认为，我跟农场唱反调，在带领归侨闹事。

特派农场保卫科长到侨校，阻止我到汕头中接委反映情况，改由一位侨校老师带我到厦门侨务局反映情况。

进入六月中，侨校转达中校委的指示，将我编入大先班，七月初参加高考。同年考取福建第二师范学院。
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我气喘老病频频发作，根本无法上

课，因此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，回农场休养。由于我能拉手风琴，周末夜开展活动请我伴奏、教唱歌，耕作区还让我抄“人民公社60条”，自此算我“入伍”。

1961年底，接侨船工作组组长李祥云，到各农场视察。

到双弟后专程由场长书记陪同，步行3公里多，到寨仔村探望我，对我的气喘病特发话，明年天气暖和到北京大医院治疗，住到中侨委。这之后我的境况大有改善。1962年将我从小学调到场宣教科。(刚到汕头当晚，因冲凉引发气喘，李组长叫了担架将我送到医院

救治，住院两天。)

1961年，农场调来了南下干部徐运保当场长。这是一位敢担当的好干部，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，三结合时受群众拥护当革委会主任。1970年被上级借调出国到非洲塞内加尔指导种甘蔗。

回来对同仁说，非洲人一天只吃一顿饭，长得胖胖、身上油腻的样子。

热带物产丰富，人们的食欲反而不高。以前，邦夏归侨说一天只吃两顿饭，是可以相信的。(完)

贝仲敏

2022-4-29

